

农村留守家庭的夫妻感情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964份农村留守妇女调查数据

陈飞强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妇女理论教研部, 湖南 长沙 410006)

摘要: 基于湖南省964份农村留守妇女调查问卷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心理不适感对农村留守家庭的夫妻感情影响显著, 心理不适感越强, 夫妻感情会越来越变差。相对于“没有变化”, 个人年收入、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与公婆关系的变化、与子女关系的变化、丈夫联系时最关心的问题、丈夫探亲频率、有烦恼时是否向丈夫倾诉影响显著, 其发生比率分别为1.428、1.565、1.795、5.765、2.274、1.592、1.215。对婚姻感情发生变化担心的影响极为显著, 担心婚姻感情发生变化的农村留守妇女, 其夫妻感情变差的可能性较之没有这种担心的留守妇女增加约8.18倍。个人劳动负担负向影响显著; 年龄、身体健康程度和夫妻之间的联系频率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 农村留守家庭; 留守妇女; 夫妻感情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5)03-0053-06

Emotive changes of couples of hometown-remaining familie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964 survey data of left-behind women

CHEN Fei-qiang

(The Party School of Hu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Changsha 410006, China)

Abstract: The data from 964 questionnaires of rural left-behind women in Hunan province show that, psychological uncomfoting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emotion of couples of hometown-remaining families, which have signaled that the stronger the uncomfoting is, the worse the emotion of couples is. Compared with the state of "no change", there are many variabl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motion of couples of hometown-remaining families, such as personal income, improvement of family economic situation, change of the relationship with parents-in-law, change of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ldren, husband's most concerning problems, the frequency of home visits, talk to her husband when there is trouble, and the ratios of the factors mentioned above are 1.428、1.565、1.795、5.765、2.274、1.592、1.215 respe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the worry of marriage change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motion of couples of hometown-remaining families, and the possibilities is 8.18 times higher for the women worrying about the change of marriage than that of the women without worrying about the marriage change. Furthermore, labor burden is the significant factor also, while age、health statue and their husbands' frequency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m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Key words: rural left-behind families; left-behind women; emotion towards spouse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 由于大量男性劳动力进城务工, 而妻子留守家中, 农村出现了规模十分庞大的留守妇女群体, 其规模“在全国已达6 000至7 000万之

多……且人数还在逐年递增”^[1]。对于农村留守家庭而言, 丈夫外出务工有助于提高家庭收入和改善家庭生活, 但是, 夫妻双方长时间的分离也可能影响到夫妻之间的感情, 甚至可能使夫妻之间面临婚变的风险, 从而影响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当前, 学界关于农村留守家庭夫妻感情变化的研究中, 大体呈现出三类不同倾向的观点。

第一类观点倾向于强调丈夫外出务工和妻子

收稿日期: 2015-04-09

作者简介: 陈飞强(1981—), 男, 湖南邵东人,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社会学。

留守家庭分居状态的消极影响。项丽萍认为,“‘男工女守’分工的直接后果是夫妻共享时间的减少和夫妻的异质性增强……直接影响到夫妻关系的变化和婚姻的质量,有的还导致夫妻感情淡漠,家庭解体”^[2]。王玉开等人认为,外出务工和两地分居加深了乡村夫妇之间的猜疑和隔阂,从而带来感情危机,与之相伴的是农村离婚率呈上升趋势^[3]。左小川指出,“留守不利于婚姻的幸福,使婚姻稳定性受到挑战,夫妻关系淡薄”^[4]。吴惠芳等认为,“丈夫外出务工……因空间距离而长期无法与妻子共同生活,因而减弱了夫妻之间的情感满足和支持,并导致婚姻的情感满足功能进一步弱化”^[5]。第二类观点承认夫妻两地分居状态的消极影响,但强调绝大多数农村留守家庭的夫妻感情仍然保持稳定,夫妻感情恶化的情况只是少数。魏翠妮强调,“从总体上来看,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是稳定的,分居模式对夫妻感情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她也承认,“留守妇女的家庭婚姻稳定性比一般家庭的稳定性要低,分居模式对夫妻感情的不利影响是值得注意的”^[6]。金一虹认为,“留守妻子在家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对丈夫‘独自在外快活不顾家庭’、‘不能承担养家义务’心生不满”,从而影响夫妻感情,但“但目前尚无充分数据证明分散就业、分散居住,已导致家庭普遍出现结构性破损”^[7]。叶敬忠、陈敏、张永英等人也基本持上述观点^[8-10]。第三类观点则认为,夫妻长期分居两地不但没有弱化夫妻感情,反而增进了夫妻感情。崔应令发现,“夫妻单方的外出打工没有使得两地夫妻关系更加不稳固,也没有加深夫妻间的隔膜,反而因为外来的压力推动了双方对夫妻情谊更为珍惜”^[11]。

上述研究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于农村留守家庭夫妻感情关系的认识,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散落在关于农村留守家庭其他主题的研究之中,学界尚未对农村留守家庭中的夫妻感情关系进行过系统的专题研究;同时,已有的对农村留守家庭夫妻感情的研究基本上只是相对简单的描述性分析,有的还只是进行演绎式的逻辑推论,而基于实证调查数据的解释性分析则还是空白。因此,笔者拟基于2012年湖南省农村留守妇女调查的有关数据,实证分析农村留守家庭中的夫妻感情变化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二、变量的选择与测量

数据来源于湖南省妇联办公室和湖南省妇女

干部学校于2012年联合开展的“湖南省农村留守妇女调研”项目^①得到的964份有效问卷。研究重点在于对农村留守家庭中夫妻感情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了考察影响农村留守家庭中夫妻感情变化的各种因素,在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这些影响因素分为以下五个维度:农村留守妇女的个体身心状况、生产劳动情况、日常生活经历、婚姻家庭情况和夫妻互动情况,每个维度均包含若干个具体变量。具体测量方式如下:

因变量的测量方面,考虑到因变量是农村留守家庭的夫妻感情变化情况,因此根据农村留守妇女对问卷中“丈夫外出打工对你们的夫妻感情有什么影响”问题的回答来测量,该问题的答案分为“很大改善、有所改善、基本没变、有所变差、明显变差”五个选项。基于分析的需要,将“很大改善”和“有所改善”合并为一类,视为夫妻感情得到了改善;将“有所变差”和“明显变差”合并为一类,视为夫妻感情变差。这样,因变量归类为“改善、没变和变差”三类,处理为三分变量,以“没变”为参照类,采用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自变量的测量方面:自变量分为个人身心状况、生产劳动情况、日常生活情况、婚姻家庭情况、夫妻互动情况五个维度,每个维度均包含若干个具体变量,具体测量方式如下:

个体身心情况:年龄,按调查对象的实际年龄;身体健康状况,按“很好、较好、一般、不太好、很不好”分别赋值5、4、3、2、1分;心理不适感:问卷中询问了调查对象在丈夫务工期间是否存在“孤单、心中不踏实、害怕、容易烦恼和激动、压抑、焦虑”等情况,答案项为“没有、偶尔、有时、经常”(第5个答案项为“不好说”,因其意义不明显,不纳入统计),分别赋值1、2、3、4分,得分越高,表明心理不适感越强;然后对这六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因子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式为最大方差旋转法,KMO和Bartlett的检验sig值为0,方差贡献率为64.433%),提取出一个公共因子,命名为“心理不适感因子”。

生产劳动情况:个人劳动负担是否加重,“是”为1,“否”为0;个人收入,问卷中答案分为7个收入区间,处理为连续型变量,分别按1~7赋值;

日常生活经历:被欺凌的经历^②，“有”为1,“无”为0。

婚姻家庭情况：丈夫给家里汇钱的数量，问卷中答案分为 7 个收入区间，处理为连续型变量，按等次从低到高分别赋值 1~7 分；丈夫外出打工后家庭经济状况是否改善，“是”为 1，“否”为 0；与公婆关系的变化，分为“有很大改善、有所改善、基本没变、有所变差、明显变差”五类，处理为连续型变量，分别赋值为 5、4、3、2、1 分；与子女关系的变化，分为“有很大改善、有所改善、基本没变、有所变差、明显变差”五类，处理为连续型变量，分别赋值为 5、4、3、2、1 分；是否担心婚姻感情会发生变化，“是”为 1，“否”为 0；婚姻家庭的稳定感，“稳定”（包括问题中的“非常稳定”和“比较稳定”两项答案）为 1，“不稳定”（包括问题中的“有一点不稳定”和“很不稳定”两项答案）为 0。

夫妻互动情况：丈夫外出打工期间的联系频率，将原问卷中的答案合并后分为“每周都有联系、每月一两次或更少”两类，每周都有联系=1，每月一两次或更少=0；联系时丈夫最关心的问题是否是“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夫妻感情”，“是”为 1，“否”为 0；丈夫的探亲频率，将原问卷中的答案合并后分为“每半年至少一次、每年一次或更少”两类，每半年至少一次=1，每年一次或更少=0；有烦恼时是否向丈夫倾诉，“是”为 1，“否”为 0；遇到困难时丈夫的帮助程度，分为“没有帮助、帮助较少、帮助较多、帮助很多”四类，处理为连续型变量，分别赋值 1、2、3、4 分。

表 1 为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统计数据显示，认为丈夫外出务工后夫妻感情得到改善的占 17.1%，认为夫妻感情没有变化的占 73.9%，认为夫妻感情变差的占 8.9%。可见，绝大多数农村留守妇女认为丈夫外出务工后夫妻感情保持稳定状态。究其原因，一是家庭经济条件改善的补偿效应。调查显示，92.7%的调查对象表示丈夫外出务工后家庭经济条件有所改善。较之那些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家庭，丈夫外出打工后家庭经济条件有所改善的家庭中夫妻感情保持稳定的比例要高 40.7%。由此可见，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可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因夫妻分居而带来的负面效果，并作出替代性补偿，即以物质上的满足来补偿或慰藉精神上的需要，或者说是物质上的满足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留守家庭中夫妻的感情^[12]。二是抚育子女的情感转移效应。样本数据显示，59.2%的留守妇女

之所以没有外出务工，是因为“有孩子需要照顾”。

表 1 自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变 量	均值	标准差
个人身心状况		
年龄	39.240	8.59
心理不适感因子	0.000	1.000
身体健康状况	3.550	0.838
生产劳动情况		
个人劳动负担是否加重	0.420	0.493
个人年收入	1.730	0.828
日常生活经历		
有无被欺凌的经历	0.262	0.440
婚姻家庭情况		
丈夫给家里汇钱的数量	2.910	0.919
家庭经济状况是否有改善	0.922	0.269
对婚姻感情发生变化的担心	0.280	0.449
与公婆关系的变化	3.120	0.518
与子女关系的变化	3.140	0.602
婚姻家庭的稳定感	0.867	0.340
夫妻互动情况		
丈夫的联系频率	0.730	0.443
丈夫的探亲频率	0.610	0.489
联系时丈夫最关心自己	0.164	0.370
有烦恼时向丈夫倾诉	0.327	0.470
遇到困难时丈夫的帮助程度	2.730	0.841

可见，抚育子女成为很多留守家庭做出丈夫外出务工、妻子留守家中这一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体现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婚姻家庭关系的主要意义——对于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婚姻的主要意义是在确立对孩子抚育的责任”^[12]，“子女抚育仍然是婚姻最为重要的任务”^[13]。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化传统，留守在家的妇女除了处理生产生活方面的必要事务外，将自己的精力都投入到子女的抚育工作中，她与在外务工丈夫的婚姻感情则更多地转化为亲子感情，从而降低了对夫妻感情的需求度，并使她们自认为夫妻感情稳定。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农村留守妇女一般不愿意向外人显露自己的感情尤其是负面感情，所以真正因为夫妻分居而对夫妻感情造成不利的比重还要更高^[6]。因此，一部分留守妇女实际上是在家庭理性决策和以家庭整体利益为本位的价值观念面前牺牲了自己的情感需要，以此来保持了夫妻感情的高稳定性。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研究采用 SPSS21.0 进行统计分析。由于因变量为三分变量（即夫妻感情的变化状态有“改善、没变和变差”三个取值，以“没变”为参照类），运用多值 Logistic 回归分析（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分析)方法探讨农村留守家庭夫妻感情变化的影响因素,数学模型为 $\ln[p/(1-p)]=B_0+B_1x_1$ 。其中, $p/(1-p)$ 为发生比,即农村留守家庭夫妻感情“改善”或“变差”的概率(p)与“没有变化”的概率($1-p$)的比值。 B_i 为模型的偏回归系数,表示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某一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时,因变量发生比的对数值的变化

值,它反映了各自变量对留守家庭夫妻感情变化概率的影响程度。

表2是多值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根据表2,模型1显示了促进留守家庭中夫妻感情改善的各种影响因素,模型2显示了导致留守家庭中夫妻感情变差的各种影响因素。

表2 农村留守家庭夫妻感情变化的影响因素

	模型1 夫妻感情的变化—— “改善”对“没有变化”			模型2 夫妻感情的变化—— “变差”对“没有变化”		
	B	标准误	Exp(B)	B	标准误	Exp(B)
个人身心状况						
年龄	-0.006	0.016	0.994	0.038	0.025	1.039
身体健康程度	-0.244	0.173	0.784	0.105	0.246	1.110
心理不适感	0.006	0.140	1.006	0.576**	0.184	1.780
生产劳动情况						
个人劳动负担	-0.525 ⁺	0.305	0.592	1.387***	0.405	4.003
个人年收入	0.356*	0.154	1.428	0.191	0.239	1.211
日常生活经历						
有无被欺凌的经历	-1.210***	0.363	0.298	-0.030	0.373	0.971
婚姻家庭情况						
丈夫给家里汇钱的数量	0.008	0.152	1.008	-0.105	0.242	0.900
家庭经济状况是否有改善	0.448	0.529	1.565	-1.122 ⁺	0.660	0.325
与公婆关系的变化情况	0.585 ⁺	0.324	1.795	-0.388	0.401	0.678
与子女关系的变化情况	1.752***	0.319	5.765	-0.622 ⁺	0.337	0.537
对婚姻感情发生变化的担心	0.024	0.350	1.024	2.217***	0.450	9.181
婚姻稳定感	-0.597	0.462	0.550	-1.262**	0.417	0.283
夫妻互动情况						
丈夫联系频率	-0.292	0.322	0.747	0.678	0.436	1.969
丈夫联系时最关心的问题是否是自己	0.821**	0.310	2.274	-0.937	0.693	0.392
丈夫探亲频率	0.465 ⁺	0.276	1.592	-0.346	0.380	0.708
有烦恼时是否向丈夫倾诉	0.195	0.267	1.215	-1.164*	0.506	0.312
遇到困难时丈夫的帮助程度	-0.156	0.163	0.855	0.160	0.245	1.173
常量	-8.180***	1.423		-1.621	2.013	
N		594			547	

卡方值=326.194; Sig.=.000; -2Log Likelihood=650.546

Cox & Snell R²=.392; Nagelkerke R²=.506

注: +P 0.1; *P 0.05; **P 0.01; ***P 0.001。B值为偏回归系数; Exp(B) 是发生比率,又称相对风险比,表示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时给原来的发生比所带来的乘数影响,即自变量变动一个单位使原来的发生比变动多少倍[Exp(B)-1]。

个人身心状况方面,心理不适感影响显著,心理不适感越强,夫妻感情越可能变差。这可能是因为,丈夫长期在外将导致部分农村留守妇女的不良情绪明显加剧和孤单、心中不踏实、害怕、容易烦恼和激动、压抑、焦虑等心理问题突出,进而引发夫妻矛盾,影响夫妻感情。年龄和身体健康程度影响不显著。

生产劳动方面,个人劳动负担负向影响显著,负担越加重,夫妻感情越可能变差。丈夫外出务工后个人劳动负担加重的农村留守妇女,夫妻感情变差的发生比率是那些劳动负担没有加重的农村留守妇女的4倍。可能的原因是,丈夫外出务工、妻

子留守家庭的离散化生存打破了原有的家庭分工模式,留守妻子在家独自面对沉重的家庭负担,会片面地认为“丈夫独自在外快活不顾家庭、不能承担养家义务,从而心生不满”。这种状况极易引发夫妻之间的矛盾,对夫妻感情造成负面影响。

个人年收入影响显著,收入越高,夫妻感情越能得到改善,其发生比率是那些个人年收入没有变化的农村留守妇女的1.428倍。可能的原因是,从两性平等的角度来看,留守妇女个人年收入越高,越能提高其在家庭中的地位 and 话语权,建构与丈夫之间更平等的关系,越有利于夫妻感情的融洽。

日常生活经历方面,被欺凌经历有显著影响。

与那些没有被欺凌经历的农村留守妇女相比,有过被欺凌经历的留守妇女在夫妻感情方面得到改善的可能性仅仅相当于前者的 29.8%。“当前,由于男性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农村往往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这样的家庭人口结构和居住方式,既导致家庭的安全防范力量大大减弱,也致使整个村庄的社会治安防范力量较弱,社会治安隐患增加^[14],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农村留守家庭的安全风险。农村留守妇女自然更容易遭遇被欺凌事件,她们一旦被欺凌,将面临沉重的心理压力,就会对丈夫抱怨、责怪,丈夫反过来也会进行指责,夫妻矛盾激化,夫妻感情恶化。

婚姻家庭状况方面,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情况影响显著,发生比率为 1.565。对于农村留守家庭而言,如果丈夫外出务工没有实现增加家庭收入和改善家庭生活质量这一目的,那就很可能使得妻子产生不满,影响夫妻感情。

与公婆关系的变化情况影响显著,发生比率为 1.795。丈夫外出务工后,农村留守妇女与公婆的关系如果能够得到改善,将会促进其夫妻感情的改善。可能的原因是,公婆在儿子外出务工时,一般会在媳妇与儿子之间充当融合剂的角色,使其关系更加和睦。特别是当儿子出现有损夫妻关系的行为时,公婆会从维护儿子家庭稳定的角度教育儿子,并安抚媳妇,从而增进留守妇女对夫妻感情和共同生活的信心。

与子女关系变化情况的影响最为显著,发生比率为 5.765。丈夫外出务工后,农村留守妇女与子女的关系如果能够得到改善,将会大大促进其夫妻感情的改善,由此可见亲子关系在夫妻感情中居于独特的地位。费孝通认为,“孩子不但给夫妇创造了一个共同的将来的愿望,而且把这空洞的将来,具体地表示了出来……孩子出生为夫妇两人创造了一件共同的工作,一个共同的希望,一片共同的前途……稳定夫妇关系的是亲子关系”^[12]。调查发现,很多农村家庭的功能运作仍然是围绕着亲子关系而展开的。丈夫外出打工是为了改善家庭经济境况,说到底还是为了孩子。如果留守妇女与子女的关系能维持得良好并不断改善,将会使得外出务工丈夫倍感欣慰:一方面是留守妻子尽到了做母亲的责任,另一方面是自己外出打工的辛劳没有白费。这无疑有助于增进夫妻之间的体谅和理解,从而增进夫妻感情。

对婚姻感情发生变化担心的影响极为显著。担

心婚姻感情发生变化的农村留守妇女,其夫妻感情变差的可能性较之没有这种担心的留守妇女将增加约 8.18 倍。对于农村留守家庭而言,因为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使留守妇女的婚姻不得不经受时间和空间的考验。考虑到城市生活相对于农村生活的复杂性,且诱惑多,约束少,一些留守妇女不由担心外出务工的丈夫做出背叛夫妻感情的事情,由此而带来的婚姻危机感、心理压力将可能扭曲她们的心态和行为,如对丈夫的信任感降低,对丈夫产生怀疑,甚至做出一些偏激的行为,从而引发夫妻之间的矛盾,导致婚姻信任度下降和夫妻感情不睦。

婚姻稳定感影响显著。农村留守妇女感觉到婚姻越稳定,夫妻感情就会越稳固;而若是她们感觉到婚姻越不稳定,夫妻感情变差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对于感到婚姻不稳定的留守妇女而言,其夫妻感情保持稳固的发生比率仅为感到婚姻稳定的留守妇女的 28.3%。这可能是因为,留守妇女越感觉到婚姻不稳定,其对丈夫的信任感可能越低,越可能产生危机心理和做出一些偏激行为,从而引发夫妻矛盾,导致夫妻感情不睦。

夫妻互动情况方面,丈夫联系时最关心的问题影响显著,其发生比率为 2.274。丈夫在联系时最关心的问题是不是妻子的身体状况和夫妻感情,则会对夫妻感情的改善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丈夫探亲频率影响显著。相对于丈夫一年或更长时间才回家一次的农村留守家庭,丈夫每半年至少回家一次的夫妻感情得到改善的发生比率为 1.592。丈夫的探亲频率越高,越有利于夫妻感情的维系和改善。一般来说,夫妻在一起的时间越多且夫妻互动的质量越高,夫妻感情就越容易得到维系和发展。对留守家庭而言,夫妻之间恰恰缺乏的就是长期的共同生活。在共同生活时间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丈夫通过回家探亲的方式来增加共同生活的时间,从而维系和增进夫妻感情,就显得尤为重要。

有烦恼时是否向丈夫倾诉影响显著,其发生比率为 0.312。向对方诉说自己的烦恼是夫妻互动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夫妻之间亲密关系的一个直观反映。在留守家庭中,留守妇女成为家庭各种具体事务和农村建设的中坚力量,家庭的重担和责任大多落在了留守妇女身上,她们既要照顾老人孩子,又要从事更多地生产劳动和家务活动,还要维持整个家庭的社会联系。这一现实状况使得留守妇女面临着多方面的困境和烦恼。这些烦恼如果得不到释放或缓解,将使留守妇女形成更大的心理负担和精

神压力,也容易产生抑郁情绪和悲伤情绪,从而降低其对婚姻关系的满意度和夫妻感情的满足感。反之,如果这些烦恼能够通过一定途径得到释放,尤其是通过向丈夫诉说烦恼,得到丈夫的开导和安慰,或者丈夫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都将极大地减轻留守妇女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并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

夫妻之间的联系频率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样本夫妻之间的联系频率比较高。据调查数据,样本夫妻之间每天都联系的占19.3%,每周至少1次的占53.9%,每月一两次的占24.8%,每半年一两次或更少的只占2%。也就是说,98%的夫妻每月联系至少一次或更多。

四、结论与建议

实证结果表明,心理不适感对农村留守家庭夫妻感情影响显著,心理不适感越强,夫妻感情会越来越变差;个人劳动负担负向影响显著,负担加重的农村留守妇女,其夫妻感情变差的发生比率是那些劳动负担没有加重的农村留守妇女的4倍;个人年收入影响显著,收入越高,夫妻感情越能得到改善,其发生比率为1.428;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情况影响显著,发生比率为1.565;与公婆关系的变化情况影响显著,发生比率为1.795;与子女关系变化情况的影响最为显著,发生比率为5.765;对婚姻感情发生变化担心的影响极为显著。担心婚姻感情发生变化的农村留守妇女,其夫妻感情变差的可能性较之没有这种担心的留守妇女将增加约8.18倍;丈夫联系时最关心的问题影响显著,其发生比率为2.274;丈夫探亲频率影响显著。相对于丈夫一年或更长时间才回家一次的农村留守家庭,丈夫每半年至少回家一次的夫妻感情得到改善的发生比率为1.592;有烦恼时是否向丈夫倾诉影响显著,其发生比率为0.312;被欺凌经历影响显著;年龄、身体健康程度和夫妻之间的联系频率影响不显著。

根据上述分析,要保持农村留守家庭夫妻感情的稳定或者使之得到改善,就必须使农村留守妇女的劳动负担合理化,减轻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压力和心理不适感;要切实改善农村留守家庭的经济状况,提升其生活质量;要建立和维系农村留守家庭中良好的公婆关系和亲子关系;要保障外出务工丈夫的探亲权利,增进留守家庭夫妻共同生活的机会,进一步促进农村留守家庭中夫妻之间的沟通和

互动;此外,要切实改善农村治安环境,为农村留守妇女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生活环境。

注 释:

- ① 数据来源及样本情况的详细介绍请参见:陈飞强.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南省964份调查数据[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
- ② 问卷中问及:丈夫外出务工期间,您是否遇到被抢、被盗、被骗、被打、被骂、小孩被欺负、遭遇强奸等情况,调查对象只要遇到过上述一种情况,就定义为有过被欺凌的经历。

参考文献:

- [1] 江晓红.农村留守妇女群体生存状况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基于宁夏南部山区的调查[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92-97.
- [2] 项丽萍.农村留守妇女:一个值得关注的弱势群体[J].广西社会科学,2006(1):176-179.
- [3] 王开玉,吴丹.民工潮冲散“四旧同堂”——社会转型中乡村家庭关系研究[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07-19.
- [4] 左小川.农村“留守妇女”的问题研究——湖南省岳阳地区“留守妇女”现状调查分析[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7(11):172-173.
- [5] 吴惠芳,叶敬忠.丈夫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影响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138-147.
- [6] 魏翠妮.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研究——以苏皖地区为例[D].南京师范大学,2006:33-34.
- [7] 金一虹.离散中的弥合——农村流动家庭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9(2):98-102.
- [8] 叶敬忠,吴惠芳.丈夫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婚姻关系的影响[J].中州学刊,2009(3):130-134.
- [9] 陈敏.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夫妻关系研究——以成都市留守妇女为例[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13:36.
- [10] 张永英.农村留守妇女面临的主要问题与需求——基于四省定性调查数据的分析[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3(5):31-35.
- [11] 崔应令.外部迫力与内部整合——打工潮背景下的乡村夫妻关系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51-55.
- [12]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13] 许传新.西部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97-106.
- [14] 陈飞强.农村留守妇女的生存困境及其对策——基于湖南省的调查[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3(6):29-35.

责任编辑:陈向科